

論 点 摘 編

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整治形式主义

韩庆祥在《光明日报》2020年4月20撰文指出,形式主义是我们党内的作风顽疾。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形式主义是一大障碍,必须坚决杜绝。整治形式主义,就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勇气解决所存在的问题。一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二是将力戒形式主义纳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融入巡视巡察制度之中。三是不断重申并强调党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组织路线与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从制度上保证各级领导干部注重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问题、作出决策,把群众路线制度化,从制度上保证把政治上过得硬、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强、有作为的干部选拔出来。四是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变陈旧保守、低级落后的治理方式。如何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实质上是一个治理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既要找到把党的要求与群众诉求的结合点,既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中,又改进治理方式,由注重过程向注重结果转变,从挑毛病向解决问题转变。五是厘清不同部门、岗位间的职责边界,科学规范属地管理,防止层层向基层转嫁责任。

准确理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

赵秀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自我革命”的内涵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守正”为本,坚持对的,继承党的优良传统;“革故”为先,破字当头,纠正错误,修正偏差;“鼎新”为要,与时俱进,善于出新、创新。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底线思维,恪守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理论基础等边界和原则,还要同继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做到“守正”。“革故”,直面问题,正确对待

错误;破字当头,避免思想僵化;刮骨疗毒,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无论“守正”,抑或“革故”,最终都要落实到“鼎新”上,体现在党自身的与时俱进、从严治党的新发展等方面。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建设的理论内涵和制度支撑

李心记在《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实现政治强党与制度治党相统一,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特色和根本要求。要建立健全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的体制机制。加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需要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来把准政治方向,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来强化政治领导,以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来夯实政治根基,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来净化政治生态,以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来提高政治能力,以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来永葆政治本色。

新时代党的政治领导力提升面临的问题及其治理进路

蔡清伟在《许昌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撰文指出,党的政治领导力的提升不仅是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保障,也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主导性话语。研究新时代党的政治领导力提升问题,可以从党内政治价值、制度和党员角色三个维度展开。破解新时代党的政治领导力提升的困境,应以强化党的政治标准、政治要求和政治使命为主要抓手。政治标准是党在其领导活动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价值引领,突出政治标准,以提升党的领导力之价值选择的政治认同;政治要求集中体现在党的制度化层面,突出政治要求,通过制度化的政治要求来规范、制约、引导和激励党组织成员,以提升党的领导力的政治性权威;突出政治使命,增强党员的政治角色意识和使命感,以达成政治领导力的价值目标。

对政治越有疏离感越不参与政治吗

孟利艳在《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注重身份、相互关系与生活方式的选择以求个体的自我实现,以及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政治”成为青年政治参与的新模式。根据政府信任和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关系类型来界定青年和政治的疏离程度,其中,疏离感强的包括从属者、退出者,疏离感弱的包括建构者、支持者。并将生活政治参与分为三种类型,线上关切式、线下关切式、线下吸纳式。在此基础上,检验青年的政治态度偏好和生活政治参与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疏离感强的并非完全脱离政治。退出者虽然有较少的社区参与等线下吸纳式和线下关切式政治参与行为,但是他们建构了自我话语空间,更多地参与线上关切式政治活动;从属者有较少的线上关切式政治行为。疏离感弱的也并非参与各种正向生活政治。建构者有更多社区吸纳式行为,但也更多参与线下关切式等冲突政治行为;支持者是政治结构的核心力量,较多参与社区活动,较少参与线上关切式等冲突生活政治;投票、选举等线下吸纳式政治参与取决于制度设计,和青年的政治态度偏好没有显著线性关系。这对于我国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引导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全球视野科技创新战略思想

盛辉在《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当前,伴随着世界科技与产业革命的不断兴起,科技创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史为鉴,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强调科技创新发展的全球性和世界性,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始终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因此,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利用世界科技创新资源,实施科技开放创新;积极共筑科技命运共同体,应对世界共同主题和严峻挑战,实现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享发展;采取非对称性赶超战略,实施科技弯道超车,实现后发超越;从创新目标、创新路径和创新主体等方面全面加强和促进科技创新全球化,不断增强科技创新发展的全球竞争力和世界影响力。中国全球视野科技创新战略思想为我国新时代实施科技创新发展、

实现世界科技赶超和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核心特色咋凸显

张祝平在《人民论坛》2020年03月下撰文指出,国家中心城市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中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已经确立了九座国家中心城市,这些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肩负着时代使命,对区域经济、区域城市群发展具有引领作用:促进我国更平衡、更充分地发展,推动我国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增强我国城市的发展内生动力。国家中心城市应具备历史特色、时代特色、世界特色这三大核心特色,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中心城市的“特色”塑造,应强化责任与使命、推动产业创新、培育特色城市文化,从而让国家中心城市更具生命力。

农田水利设施供给质量缺憾及其改善

杜威漩在《中州学刊》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农田水利设施供给质量缺憾的内涵是指被提供出来的农田水利设施对农民灌溉需求没有达到应有的满足程度,具体表现为农田水利设施满足农民灌溉需求的非充分性、弱可及性和非普遍性,可分为投资缺憾导致的农田水利设施供给质量缺憾、建造缺憾导致的农田水利设施供给质量缺憾、管护缺憾导致的农田水利设施供给质量缺憾等三类。农田水利设施供给质量缺憾的生成逻辑是,在投资、建造、管护每一环节或者某一环节,供给主体功能的脆弱、供给机制的失灵导致被提供出来的农田水利设施满足农民灌溉需求的非充分性、弱可及性和非普遍性。改善农田水利设施供给质量缺憾,需要强化农田水利设施投资、建造、管护各环节的主体功能,完善农田水利设施投资、建造、管护各环节的供给机制。

农业资本深化与要素配置效率的关系

侯明利在《经济纵横》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实现要素集约利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沿着“资本深化—农业要素结构调整—农业要素配置效率”的脉络,结合产业间要素流动、农业内部要素匹配在各阶段的不同表现,对要素数量、要素配比、要素相对价格等指标的变化进

行分析。结果发现,资本深化与农业要素配置效率密切相关,并且在不同阶段呈现一致性,农业资本的特殊属性、与农业经营模式的匹配度、投资主体、市场发育等都是现阶段要素配置低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现阶段我国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期,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引入使要素配置不断调整,农业要素配置效率随之变化。而要实现高产出下农业要素的优化配置,关键在于资本要素配置。可从以下几方面发力:一是提高政府投资效率。二是发展现代农业。三是加强农业多元化投资主体的协调合作。四是促进农业信贷市场发育。

粮食基因编辑潜在风险的法律防范

夏志红在《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关于粮食基因编辑的种种争论,其焦点并不在于基因编辑技术本身,而在于基因编辑食品的商业化对人类生存所构成的潜在威胁。目前流行的应对此种风险的妥协性立法所建构起的防范机制仅以标识为要求,以消费者知情为大吉,而任凭基因编辑食品的商业化肆意发展。现有机制所要求的标识因缺乏结论性的科学依据,与基因编辑食品的安全性无必然联系。非自然的人为基因编辑食品对人的健康乃至生命的威胁具有后果不可逆的潜在风险,理应严加防范。相关立法必须建立在人类的生存价值与基因编辑食品的商业化价值的比较之上。任何哪怕具有丝毫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的潜在风险的产品,其商业化均是不能容忍的。据此,应坚持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充分尊重粮食基因编辑技术的科学研究的同时,创设切实有效的法律防范制度,以确保人类生存的安全。

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农户主体问题

申惠文在《河北法学》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农户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主体,是我国目前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典型特征。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是传统家文化观念的阶段性表达,是社会主义观念的阶段性表达。随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推进,“农户”的涵义越来越不确定,“农民户”、“农业户”和“农村户”发生了

分离。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不能满足农户成员土地权益保护的新要求,与现代民事法律体系存在逻辑的悖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要求,逐步固化农村承包经营户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户的成员,逐步将农户主体变革为农民个体,重塑国家、集体和成员的法律关系。

新时代监察改革深化的法治逻辑

王建国,谷耿耿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新时代围绕监察权所展开的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基于历史经验结合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所进行的重大变革。无论是从权力地位、职权范围还是权力行使方式来看,八二宪法第五次修正案所确立的监察权同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监察权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权力监督机制的不完善、现代法治限制公权力的价值追求以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彰显了当下中国监察体制改革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坚持党的政治领导、遵循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契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路径赋予了监察改革的正当性。进一步深化监察改革需要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着力设计监察权独立行使的限度、监察权反腐败全覆盖与人权保障、监察权同其他国家权力有效衔接的法治化路径。

“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法律性质

郭少飞在《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撰文指出,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乃区块链智能合约的集合,具备主体、财产(代币)、成员权、表决机制等组织要素。去中心化自治组织设立时,投资者经由智能合约完成投资,取得投票、分红等权利,类似于众筹尤其股权众筹,但两种模式下所涉主体关系、组织治理方式存在本质差异。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亦非我国现行法上的商事信托,其法律关系结构区分显著;更非公司,不具有公司完备的中心化组织机关及法定性特征。从商事合伙主体要素、可推知的投资者意思、发起人最终控制者地位、衡平投资者保护与技术产业发展考量,当下适宜将其界定为有限合伙。

文化特质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朱富强在《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一个人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问题,而合作关系则与特定社会的文化伦理有关。显然,儒家文化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特质,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以及天人合一的和谐社会建设。相反,西方文化根植于基督教的“帝本”观,宣扬的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关系。正因如此,要夯实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就需要加强儒家文化的重塑。同时,通过正确地辨识儒家的高次元文化特质,有助于提升文化自信;进而将中国经济学范式构建、制度变革和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根基于这一高次元文化传统之中,也有助于提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城市文化开放性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

庞玉萍,刘叶青在《城市发展研究》2020年3期撰文指出,城市连通性和城市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而城市人口多样性和城市创新能力的关系并不显著。开放、连通性好的城市具有开放的文化,这种文化特性促进了个人、团队、组织的创新能力,从而促进了城市的整体创新能力。政策启示在于:第一,要提高城市创新水平,首先要积极对外开放交流,与全球研究机构保持良好的连通,而不是封闭自我;尤其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人们的连通不仅依靠有形的交通设施,更要依赖无形的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连通。第二,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政府和企业都应注重人才的引进和人才政策的实施,以及青年科技人才和一线创新人才的培养等,提升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提升城市创新水平。

师生共同体的伦理审视

宋晔,刘光彩在《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作为理解师生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师生共同体可以看作是校园师生关系的一种理想表现形式,它是具有共同愿景的师生在不同层次的人际交往中形成的教育活动组织和伦理实体,或者说是教育性与伦理性价值并存的综合体,旨在让教师和学生平等、和谐、民主的原则下

互相交流沟通,共同学习成长。虽然师生人际、己群、群际伦理正面临紧张、失衡、冲突等困境,但不能否认其所蕴含的丰富伦理价值,包括人际交往的关心共识,己群互动的公正追求,群际关系的认同要求。同时,为进一步促进师生共同体的伦理回归,需要从伦理的角度出发,深化伦理理念,增强师生共同体的伦理意识;强化伦理责任,促进师生共同体的伦理发展;提高伦理能力,凝聚师生共同体的伦理力量。

解构与重构:基于自媒体信息碎片化传播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杨柳青,王建新在《学习论坛》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自媒体信息碎片化传播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外源”和“内生”环境,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内容与形式上被解构:信息传播主体分散化冲击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主流话语权,信息传播内容碎片化拆解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宏大叙事传统,信息碎片化传播所依赖的浅层理解和感性认识隔离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性推演的论证方式,碎片化思维方式导致的注意力分散的短时记忆拆解了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整体结论的分析和理解。在自媒体通过“网络赋权”塑造的全新话语权力平台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作出重构:在把握话语权的前提下,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平等对话机制;加强微观叙事基础上的宏观引导,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吸引力;打破“闭环场域”并进行“分众”引导,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精准传播;聚合碎片化的虚拟空间,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空间。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从媒介与受众的关系角度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型。

农村留守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田娇艳,郭帅鹏在《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城镇化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农村留守青少年缺失家庭关爱,“家庭—学校—村社—社会”这一完整的链条发生断裂,导致农村留守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陷入困境。要以系统性思维为基点,从个人、家庭、学校、村社、社会、国家等各个层面探寻相应的解决路径,改善农村留守青少年的生存境况,解决其思想道德教育问题,帮助他们成长成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

和可靠的接班人。从个人层面来看,农村留守青少年要增强自主性。从家庭层面来看,要优化家庭结构,改善家庭氛围。从学校层面来看,要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与打造专业化的教师队伍。从村社层面来看,要创新管理服务方式。从社会层面来看,各主体之间要彼此联动,优化社会文化环境。从国家层面来看,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制度保障。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管制引入合作治理的困境及其化解

刘华涛,李俊利在《兰州学刊》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管制引入合作治理,可以促使企业主动提高生产效率,而且简化了管制程序,降低了管制难度。但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合作治理的引入,将面临管制俘获和信任考验的困境。困境的化解需要针对政府管制机构、企业和公众等治理主体进行制度完善。这是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管制引入合作治理必须要着重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也是在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管制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主要是强化政府管制机构的独立性、专业性、信任体系和问责机制建设,健全企业产权制度并强化企业的守法责任和信息公开责任,加强公众参与合作治理的制度构建等。

互联网社会的自我秩序化:可能、形式及其意义

周恒在《新闻界》2020年第3期撰文指出,网络社群通讯软件的广泛应用推动广大的互联网用户由个体走向联合,塑造出以网络社群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结构,这种鲜明的自组织倾向使互联网社会具备了自我秩序化的潜力。就当前而言,互联网社会的自我秩序化在形式上可以概括为三种:互联网行业组织的自我管理、网络服务平台的自我管理以及网络社群的自我管理。互联网社会的自我秩序化契合了我国关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时代命题,在满足网络社会秩序化需求的同时,也为社会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培养具有自治技艺的社会民众。互联网自治乃是一种兼具有效性与有限性的秩序化手段。在任何时候,互联网社会的秩序化和法治化都无法脱离政府监管而单独通过自我管理而实现。

自媒体言论监管面临的挑战、问题及策略

向长艳在《新闻爱好者》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网络言论的监管目前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难题。这主要是由于网络化逻辑下,人们的权利(力)认知发生了改变,而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却又面临制度创新不足、制度发展滞后的困境。当前,我国主要通过实名制、专项行动、对违法内容提供者的惩治并辅以行业自律等方式治理网络言论,这种仍然建立在传统思维模式下的治理方式必然存在许多问题。自媒体言论的治理,应当根据信息传播者的不同身份、传播的不同环节,有区分有重点地进行规制,既避免公权力的过分干预而限制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也防止自媒体意见表达的肆意而侵害社会秩序。

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现实困局及破解路径

牛文涛,姜润鸽在《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制度支撑,也是破解农民群体可持续生计困境并显著提升这一群体“获得感”的重要途径。70年来,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主要经历了“传统家庭养老—集体养老—新型家庭养老—社会化养老”等四个阶段的演化过程。尽管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二元”架构具备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农村养老保障产品长期供给不足,引致养老保障体系的运行成本持续增长,进行城乡统筹的所谓“转轨”成本较高。市场化参与力量相对缺失,农村养老保障的多元主体供给体系难以构建。由于可能存在的“小农意识”和短视行为以及关于养老保险产品的悲观预期,农民群体的主动参与意愿相对不足,引致这一群体广泛参与的可持续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并未有效构建。而且,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变革和运行,均受到“孝道文化”的显著影响。基于此,一要积极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责任分担机制,有效厘清相关养老主体的责任边界。二要积极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利益联结机制,有效提升农民群体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意愿。三要积极引导市场力量参与农村养老事业建设,有效满足农民群体的多样化养老需求。